

#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向后看”与“向前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本是一次讨论农业问题的普通的中央全会。由于在为召开这次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向后看”和“向前看”两个重要口号，导致会议主题发生重大变化，最终演变成一场伟大的历史转折。

## 会议主题发生变化

在举行中央全会之前，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对全会要通过的文件进行讨论，统一思想，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1978年11月10日下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幕。

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提议，成为改变会议议程的导火线。

陈云是党内善于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导人。11月12日，他在东北组讨论时率先发言，指

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的这篇题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看似平常，却深深地触及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不失为拨乱反正的一声惊雷。

## 邓小平提出“向前看”

11月25日之后，中央工作会议仍然没有按照华国锋的布置讨论原定的议题，各组的注意力开始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转到了讨论现实问题上。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一些反对真理标准讨论或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徘徊，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时刻。邓小平以巨大的担当、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慧，果断地提出：“我们这次会议是向前看的会议，

不是向后看的会议，当然向后也要看一下，为的是向前看。”这个口号的提出，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由乱到治，最终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向后看”到“向前看”，按照邓小平的解释，就是“把过去的事大体处理完，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引向未来”。

在政局混沌不清的情况下，邓小平发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果断采取一系列正确有效的举措，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稳定了局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廓清了道路。

## 开辟新道路的宣言书

政治局势稳定之后，邓小平集中精力重新考虑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在12月13日下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的讲话深入分析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些最重大最关键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

观点和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政策。这些重要论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伟大的历史转折明确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会议要开得紧凑一些，不要开得太长”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开了5天。随后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为基础，分5个部分系统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新思想、新思路和新政策，充分体现了两个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第三，经过这次全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这些成果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光辉的起点。龙平平

## 首提“对外开放”

1978年9月8日，邓小平应邀对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访问。回国后，他在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进行了一次调研活动。一周之内，74岁的他走了8个城市，一路上邓小平边听、边看、边讲，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带有突破性的观点和看法，史称“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正是在党和国家处于徘徊状态的关键时刻发表的，为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和发展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北方谈话”内容丰富，其中，邓小平还最早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邓小平指出，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重视对外开放。邓小平在本溪谈到：“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在长春时他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李正军

## 五老火锅宴：开启民营经济的盛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恰逢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于是，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5人，分别是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

## “钱和人都要用起来”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面伊始，邓小平就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接着就谈起了经济建设问题。当时，谈论的话题相当有料。比如，五老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共同的愿望：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胡子昂就这一问题进言：“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邓小平马上表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

辈。……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会谈中，胡子昂提出了“大力起用工商业人才”，荣毅仁建言可以吸引外资兴办实业，邓小平都予以积极回应。邓小平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到那时，偿还能力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 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座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谈兴甚浓。细心的邓小平看了一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五老火锅宴”正式开始。说是宴请，其实也只是家常便饭。吃的是老

北京传统涮羊肉，白水锅底、羊肉片，还有大白菜。

“五老火锅宴”结束了，工商业者的热情被燃起。此后不久，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办起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弢在天津创办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也成立了。

1979年9月22日，一些老工商业者利用境外的部分民间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后被认定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家民营企业。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会议。会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报告，建议允许闲散劳动力从事个体劳动。这是第一份关于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报告。当年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一下子冒出来31万人，比1978年整整多了一倍还多……王菲

## 历史瞬间

## 45年再回首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5周年，下面这组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照片，记载了那个激荡年代的变革瞬间。



1979年12月，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在上课。距离1977年恢复高考已过去两年，此时在校的大学生已达百万人。



1980年春，河南信阳固始县杨集大队，青年们在收鸭蛋，他们为生产队包放了500多只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改革浪潮兴起。



1986年8月25日，辽宁沈阳皇姑区明廉街道办事处，市保险公司为失业的工人发放破产企业职工救济金。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第一个宣告破产的企业。



1990年1月21日，深圳罗湖桥上穿行的人们。改革开放后，与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的罗湖口岸成为连接香港与内地的“第一口岸”。



1995年6月5日，高度383.95米的深圳市地王大厦即将封顶。这座建筑的高度当时位居世界第四、亚洲第一。当年是深圳特区成立的第15年。